

● 综 述

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苏 德 超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苏德超(1975-), 男, 四川巴中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 565.53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121-02

2002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 由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与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哲学系联合主办的“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 50 多名学者与会, 提交学术论文近 40 篇, 其中会议发表 26 篇。本次会议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了讨论:

一、对西方哲学东渐百年的回顾与反思

微观方面。北京大学杨适教授回顾了百年来的希腊哲学研究。他认为, 涉及 $\phi\nu$ (拉丁文 *on*, 英文 *being*) 的各种问题是我国大半个世纪的希腊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phi\nu$ 最基本的是作为动词的“存在”和作为系词的“是”。“是”通向“真”, “存在”通向“实”。从汉语真一实二字联结成一个词, 可以领会希腊语 $\phi\nu$ 的是一在两意何以能够相通。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探讨了 17—19 世纪中国伦理与现代性的三次遭遇。陈启伟教授、东海大学苑举正教授、佛光大学助理教授张培伦分别介绍了百年来西方“自由”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的历史, 卢梭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以及“自由主义 VS. 社群主义”在台湾的状况。德国学者 Martin Müller 描述了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被传播和研究的情况, 并对两岸学者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数据统计。华中科技大学的黄见德教授专文论述了张东荪在西哲东渐史上的贡献。此外, 学者们还对以下内容的传入或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 唯理论与经验论(高新民), 斯宾诺莎(洪汉鼎), 康德思想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的关系(李明辉), 50 年来的康德哲学(钱广华), 费尔巴哈(李毓章), 高达美(陈荣华), 清末从日本传来的哲学研究(钟少华), 罗尔斯(姚大志), 列奥·施特劳斯(张志扬, 陈家琪)。

宏观方面。张世英教授回顾了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思想界学习的主要是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五四”中的民主与科学可以类比做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与人的两大发现。科学即发挥人的主体性以认识、改造自然; 民主则是发挥人的主体性来反对封建专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西方现代哲学的译介。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 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采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主体性哲学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来, 主体性哲学重新得到了高扬, 西方哲学的东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按照文化传播的共性将西哲东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 世纪为第一阶段。人们只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 或满足于“各有各的长处”而故步自封。整个 20 世纪则是在第二阶段。人们发现两种文化的相通之处, 热衷于文化间的互释和比附, 目前刚刚跨入第三阶段。人们再次发现了文化间的同中之异, 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深入到异文化之为异文化的内核。

在回顾的基础上, 代表们进行了反思。张世英先生认为, 由于左的思想干扰, 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做“广为宣传的哲学”的哲学形态。这种“广为宣传的哲学”不太强调人的主体性, 只讲人的认识, 不讲情感、欲望和意志, “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我们从西哲在中国起伏的命运中可以吸取的根本经验教训是, 必须提倡思想上的门户开放。邓晓芒教授立足于

三阶段论认为,20 世纪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化错位。当人们自以为掌握了“西方哲学”的本质内核时,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本民族的固有思想中转圈子。邓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 10 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选择性接受、王国维之活剥叔本华、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中国化、牟宗三之误读康德、“理性”概念的普遍误解、对“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Being”的分歧、“自由”的附会等。邓晓芒强调,惟有理解这种文化错位的深层次文化根基,才能使中西文化和哲学的融通有真正的进展。武汉大学赵林教授也指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应该从广义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各种哲学思想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探讨哲学思想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与邓晓芒批判以中国哲学比附西方哲学形成对照,佛光大学龚鹏程教授和欧崇敬教授则批判以西方哲学比附中国哲学。学者们不断以自身所在的(西方的)“学科性”来思考,或“跨学科”而思考,不过是在加强西方学术概念的使用而已,造成中学的严重西化。此外,黄见德探讨了中西哲学交流的必然与必要性及其意义。张志扬认为,“西学东渐”这一说法太以“西学”为主词谓述了,落入西人“东方主义”的言筌。对中国人而言,应是“东取西学”。

二、“中国哲学”可能性

佛光大学戚国雄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哲学”时,中国学者不得不尝试从西方传统中找出一些范畴来阐明中国传统,亦即以西方哲学来建构。某些解读一时间或有高低之争,但无法证明自己是惟一或最佳的解读。这似乎意味中国哲学之存在在于解读与诠释中,存在于建构中。龚鹏程教授区分了文明转变与发展的三种基本模式:演化、变化和异化。他指出,清末流行演化论,欲演化以图强;继而搞革命,欲变化以图存。但发展到后来,其实走上的却是异化之路。现在整个社会的实际状况是:除基本饮食习惯外,当代中国人,几与欧美无异。目前整个中国哲学研究,因对传统已极隔阂,对文献又极不熟悉,对其美感品味亦不亲切,对古人之人际相处态度又甚为陌生,几乎所有人都只能采用西方哲学或科学的思考方式、观念系统来讨论中国的东西。碰到这个新“典范”所无法丈量的地方,便诟病中国哲学。龚教授提出,中国哲学的道路,就在于应切实反省过去不恰当的“现代化”作为,老老实实“归而自求”,好好清理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国哲学如此方能在现代社会重新出发,重新被认识。欧崇敬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但张世英先生认为,未来的哲学必将是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会通的哲学。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主体性进行限制和批判。在未来,科学知识、必然性将会越来越占优势。但它们越占优势时,哲学越需要有高远的境界。台湾醒吾技术学院袁保新教授也指出,中国哲学工作者试图与西方哲学交谈、会通,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可以采取“以遮为诠”的方式,间接地传达中国往圣先哲的智慧内涵,争取它对当前文明经验的解释权。另外,不同年龄的情意教育,可能是落实中国传统实践智慧更好的着力点。陈荣华则指出,从功能而非实体形上学去阐发中国哲学会更恰当。

三、翻译问题

西哲东渐,译介先行。在翻译方面,商务印书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应年和陈兆福编审专文回顾了商务印书馆与西哲东渐百年的关系。虽然百年来译介成果不少,但欧崇敬提醒说,我们尚缺乏上千种重要的哲学作品的译本。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则提出旧作还应重译,因为每一代对经典的理解和研究都不同。

在翻译中,存在不少具体问题。一个是误译。例如,陈家琪教授指出,“唯理论”恐怕就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唯”字无根据。一个是译名的混乱。目前,海峡两岸的翻译中,人名、概念等都不统一。另外还有不可译问题。张汝伦教授认为,有些西方哲学的概念当用某个中文语词去表达时,我们总会受到中文语词自身倾向性的影响。张教授提出三种解决方案:直接音译,在翻译之后再附上原文,像陈康先生那样在译文之后做大段的注释。关于不可译,邓晓芒还指出,我们应看看为何不可译,找出背后的文化心理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志学教授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思想。原作乃是一个以自己的各种元素和组织规则构成的系统,译作是另一个系统。翻译的任务就是要把前一个系统转换为后一个系统。翻译学就是探讨这种转换规律的科学。清华大学王晓朝教授认为,翻译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翻译即理解,理解即重建。王教授还探讨了翻译与诠释经典对传统的影响。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对英美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的探讨十分不足,这次学术气氛浓厚的会议还是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将辑集出版。